



人数很快就超越了中国本土时，一切都发生了逆转。

法国哲学教授布鲁诺·季格（Bruno Guigue）在日前发表的一篇文章题为“Covid-19：一个体制的崩溃”的文章中就提出，在疫情的冲击下，确实有一个体制正在崩溃，但却不是人们以为的“中国”，而是西方。中国在两个月内成功地阻止了疫情的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证明了其优越性。因为与这样一场疫情作斗争，国家机器是不可或缺的。问题是，我们的国家机器呢？它在哪里？公众健康是它关注的优先领域吗？它有能力建立新的医院吗……”这位曾经担任过法国高级公务员的学者问道。

季格教授说到了西方统治模式的实质。当我们决心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时候，便可以轻易发现西方国家政权的构成是以“投票选举”为其核心利益之所在。这就是为什么疫情再严重，法国政府却一方面呼吁法国民众要“宅在家里”、非必要不要外出，甚至关闭了除药房和超市外其他所有的商店和电影院、戏院、餐馆、咖啡馆等娱乐场所；但另一方面依然维持3月15日周日举行的市政选举，呼吁法国选民不要怕新冠病毒传染，前往投票站投票。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充分展现出西方民选体制国家政权合法性来源的重要意义。在中国武汉疫情暴发后，湖北省委书记和武汉市委书记均已被撤换。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决定。但在法国，却没有任何地方官员或政府官员会因疫情暴发而丢官。因为在民选机制中，一名官员的合法性源自于民选。票选产生的官员当然也就仅仅对选票负责。法国专家们透露，如果推迟这次选举的话，将会对执政党极其不利。这就是为什么法国坚持投票的原因。对于法国政府而言，投票结果有利于执政党高于一切；而政府对疫情的应对是否得当，则不会成为任何政治家的责任。相反，现在无论做得如何，等下一届政府上台之后，一切就都将划上句号。这样的体制决定了政权对执政能力和效益的考虑，远远抵不上对如何成功当选的考虑。

西方民选体制能否顺利运行，取决于两个先决条件：第一个是民选体制国家经济必须处于持续上升状态，无论谁上台都不会影响其经济的增长及其带来的民众生活水平的提升；第二个先决条件则是民选体制国家的生活水平要远远高于周边其他非民选国家。然而今天西方民选国家面临着这两大先决条件都开始出现分崩离析的可能性。我早就在去年的文章中预测，西方、特别是欧洲民选体制国家正在开始进入面临危机的历史阶段，原因就是中国的迅猛崛起，大大冲击了欧洲民选体制国家能够顺利运行的上述两大先决条件。令人未曾预料到的是，新冠病毒的暴发，同时冲击中国和欧洲。而欧洲至今为止的应对策略和效果都远远不如中国。这进一步在瓦解上述民选体

制正常运行的两大先决条件。这对欧洲民选国家的冲击是非常大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去年的一次内部会议上就已经宣示，西方霸权的历史性终结可能已经到来。没想到新冠病毒很有可能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们拭目以待的，是欧洲在未来数周内出现大规模患病高峰期的时候，各国政府将如何应对这个严峻的局面。很有可能欧洲民众会起来进行某种意义上的“造反”，届时欧洲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很难预测。唯一可以确认的，是欧洲正在通过新冠病毒而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一个很有可能是危机的历史阶段……

寻找“替罪羊”

应该引起我们高度警惕的是，欧洲和美国的某些势力很有可能为了掩饰其执政者应对新冠病毒不力的事实，而掀起一场将疫情在西方大范畴暴发的罪魁祸首归咎于中国的大规模舆论攻击，以转移西方民众对其无所作为或反应迟钝造成损失巨大的不满，代之以针对中国而引发的仇恨。我们看到，疫情在欧洲暴发时，部分欧洲舆论便已经开始出现反华、反华裔和华人的浪潮。紧接着便是一波又一波展开对中国的种种“批评”：中国延误遏止新冠病毒蔓延的时机、中国封城是反人权的不民主不自由之举、中国镇压“吹哨人”等明智之士、中国虚报数字试图隐瞒真实死亡人数……

当这些对中国的攻击都被事实一一击溃之后，今天在西方媒体和舆论中，正在悄悄地坐实中国是疫情产生的原始来源地的说法。一些媒体人和政客、学者开始坚持在公开场合将新冠病毒加上“中国”“武汉”等前缀，试图将中国说成是新冠病毒的始作俑者。全然不顾中国学者钟南山清楚表述的“疫情首先出现在中国、但却不一定发源在中国”的观点，硬要将这个“锅”扣到中国的头上。事实上美国很有可能是新冠病毒“零号病人”所在地的国家。因为连美国疾控中心主任都承认，美国去年九月月以来就已经有人患新冠病毒而死亡的事实……

双方显然在围绕着“谁是病毒发源地”而进行舆论交锋战。一些所谓的病毒学专家甚至将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的发源地也说成是中国，以从西方民众心理上来印证“中国是一切灾难之源”。这种做法是非常阴险的，但却很有可能也同时是非常有效的。我们必须打赢这一场新的疫情舆论战。否则对疫情之后的国际关系格局中的中国会非常不利……